

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载泽



戴鸿慈



端方



李盛铎



高其亨

清王朝自我拯救的最后努力——

五大臣出洋

王晓秋

族危机加深的影响,清朝内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多番择员 地位显赫

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禨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年9月24日,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到革命党人吴稚晖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于是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

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光绪年间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阔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使团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就达54人。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分赴各国 收获颇丰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月16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时取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勿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年12月11日出京,1906年1月16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月12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年12月7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月23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定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做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纲举目张”。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

■文摘



清宫晚期后妃生活中使用的香水一方面来源于进贡,朝廷大臣购得舶来品,遇有机会即呈进宫中,或为外国使节觐见皇帝或慈禧太后时进献的礼品;另一方面来源于朝廷对外贸易中的采购,以供宫廷日用。因此,清晚期宫廷中使用的香水主要是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外国名品。图为清宫旧藏铜镀金架架香水瓶。

古埃及人的奢侈品

香水一词,从拉丁文“perfum-nm”衍生而来,意为“穿透烟雾”。对香水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薪水”就是指日常费用,现代一般指按月支取的工资近乎古代的“月俸”“月费”,主要也是用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因此,人们常把工资称为“薪水”。

篇中有关南宋时杭州风俗说:“至来岁得周,名曰‘周啼’,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教、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段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讖,谓之‘拈周试啼’。”

乎?明代姚绉在《青溪暇笔》中也说:俗谓忙遭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由此可知,所谓“三不知”,是指某人对某件事情的开始、经过和结果而言的。

“红得发紫”源于宫廷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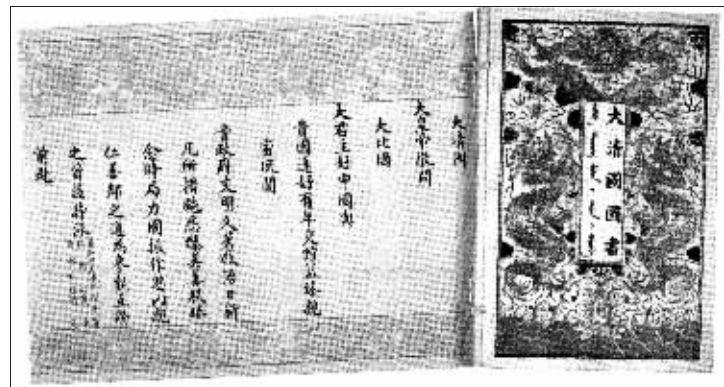
封建时代的等级尊卑十分严格,服饰穿戴也有特别规定。如黄色是皇帝的专用服色,其他人(除太监外)一概不能使用。各级官员服饰也不相同,官职品级不同,衣服颜色也各异。这种制度就是“品色衣”制度。“品色衣”制度起始于北周,形成于唐朝。宋、元、明、清沿用,只是在局部做了些调整。就唐代而言,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穿紫衣,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着紫穿红者便是身居高位者,而穿青色衣服者,官卑职微。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其中就有遭贬后的官职低微之意。那些穿着紫的达官贵人可以经常出入朝廷。于是,人们便以红色作为发达的标志,而达到紫色则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了。故而,人们常以“红得发紫”来比喻那些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人。

古代的“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一词可追溯到唐朝,杨国忠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坐到相国的位子上。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缘、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

“薪水”一词的由来

薪水本指打柴汲水。东汉以前,一般俸禄都发放实物(粮食、布帛),唐以后一直到明朝,主要以货币形式为俸禄发给朝廷官员。古代官员俸禄的名称不止一种,如“月给”“月薪”“月钱”等,而明代曾将俸禄称“月费”,后又改称为“柴薪银”,意思是帮助官员解决柴米油盐这些日常开支的费用。而在魏



五大臣出使时的《大清国致比利时国书》

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

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决定预备立宪。3天之后,即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

作者简介

王晓秋,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与世界》、《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等。



1906年,载泽访问英国伯明翰订购铁路机车。



1906年,戴鸿慈、端方于芝加哥考察宪政。

外国香水进清宫

万秀锋

香油。希腊人把香水神化了,认为香水是众神的发明,闻到香味则意味着众神的降临与祝福。在古代波斯,香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香港的杜渐先生在《书海航航》中记载:“古代埃及把牲口焚烧祭神,但焚烧牲口的气味实在难闻,祭司就发明了香水。埃及人认为香水可以使人完美,死后涂上香油,可以使灵魂升天。希腊人认为香水是神创造的。穆罕穆德最欣赏的三样东西即女人、孩子和香水。”公元前1500年,香水的用途已日趋普遍,埃及艳后经常使用15种不同气味的香水和香油来洗澡,甚至还用香水来浸泡她的船帆。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国,人们早已学会运用香料的芬芳来实现对美的追求。

香水在欧洲盛行要归功于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战争给欧洲带来了灿烂的东方文化,随着东西方贸易的不断加强,香水这种悦人悦己的产品,逐渐为欧洲人所接受和喜爱。14世纪,匈牙利制造出第一批现代香水,它由一种香精和酒精混合而成。1709年,意大利人约翰·玛利亚·法纳纳在德国科隆用

紫苏花油、摩香草、迷迭香、豆蔻、薰衣草、酒精和柠檬汁制成了一种异香扑鼻的神奇液体,被时人称之为“科隆水”(一些资料上译为“古龙水”)。1533年,教皇的侄女凯萨琳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她不仅带去了丰富瑰丽的意大利文化和生活方式,还成为法国香水文化的始作俑者,她的专职香水师开了巴黎的第一家香水公司。此后,酷爱时装和化妆品的法国人对香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香水成为上层社会和炙手可热的时尚用品,法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六和拿破仑都对香水情有独钟。随着香水业的发展,花卉种植在法国南部成为重要产业并延续至今,格拉斯市更被誉为“香水之都”。

清宫内的贵族遗香

随着香水业的发展以及对香水需求的不断扩大,对基本香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致使世界许多地方都生产用来制造香水的香草、水果、树木及挥发剂。因天然原料造价较高,使得纯天然的香水价格十分昂贵,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香水生产方法。10世纪

初,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用挥发性溶剂代替传统蒸馏法的合成香水生产法应运而生。其准确的剂量配置大大提高了香水的产量。晚清兵工专家徐建寅在《欧洲杂录》中有“(纽约兰满香水厂)楼高九层,女工六百余名,男工亦四百名,作各种香水,发运各国,每日可得数千箱。洗瓶、灌水,皆用机器,颇省人力”。由于香水的大规模生产,使之不再为贵族独享,逐渐流行于寻常百姓间。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载:“(欧洲)无论男女,浴面后发内必以香水倾之,沐浴后遍体必以香水抹之,以至衣带巾扇无不撒以香水,借馨香以去邪气。”香水成为人们日常重要的必备消费品之一。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各种新式化妆品开始在中国市场上行销,香水也随着这股大潮进入了中国贵族妇女的视线。当时许多精明的欧美制造商也针对中国市场的需要而专门设计了一批适合中国人习惯的香水。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记载他在纽约兰满香水厂看到一种专销中国市场的香水:“味似丁香,瓶高半

尺,塞以草节稻壳,上罩银箔,下粘局票二:一系白纸,印有五彩水花洋字,一系红纸,金书华字三行。”香水在进入中国贵族之家的同时,也走进皇宫。

虽然欧美香水生产厂家为打开中国市场做了种种努力,但清代中国对外来香水的使用还是相当有限,因为中国原来就有自己的香水。德龄在《慈禧野史》中记载慈禧太后所使用的香水就是自己发明的,用酒精、水和耐冬花经过三道工序混合而成。这种香水不但气味清香,而且还可以保持肌肤的弹性,具有养颜和润肤的双重功效。另外,外来香水除了价格以外,在香味等诸方面比中国本土所产化妆品并没有多少优势,如著名的上海“老妙香室粉局”和杭州的“谢福春”生产的香粉、香油,其质地细腻凉爽、香味芬芳,相对更适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因而西方的化妆品在当时一直难以与传统的脂粉相抗衡,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逐渐改观。

(摘自《紫禁城》杂志2009年2月,有删改。)